

西夏王陵形制综论

□杨 浣，王军辉

摘要：西夏王陵的选址基于三点考量：一是背山面水，依附帝都，得形势之利；二是地势高亢，绵延不绝，显帝王威仪；三是避风趋阳，坚固高敞，佑圣体平安。西夏陵园的特点是规模较小、结构单纯、观念独特、建筑不同、葬俗奇异。这既体现了西夏在王陵规划上对中原王朝帝陵设计的认同性，又保留了北方民族的文化特征，在规模上也与西夏对辽、宋、金称臣的政治地位相符合。

关键词：西夏；西夏王陵；贺兰山

作者简介：杨 浣（1975 -），男，甘肃天水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从事西夏学、西北史地研究；王军辉（1972 -），男，宁夏医科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北史地。

西夏王陵位于银川市西南郊贺兰山东麓洪积扇之上。其分布范围南起榆树沟，北至泉齐沟，东到西干渠，西抵贺兰山，东西宽约 4.5 公里，南北长 10 公里有余，总面积近 50 平方公里。^{[1]6}到目前为止，这里共发现帝陵 9 座、陪葬墓 254 座、院落建筑遗址 1 处以及砖瓦窑址若干^{[2]1}。目前学界关于西夏王陵的研究方家众多，成果斐然，代表性的著作有许成、杜玉冰的《西夏陵》（1995），韩小忙的《西夏王陵》（1998），《西夏三号陵——地面遗址发掘报告》（2007）。本文可以算作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陈列和调和之作，引述失据之处，尚乞识者见谅。

一、选址因素

古代帝王选择陵寝，十分重视“风水”形胜。理论上，一个理想的帝陵居所应该是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之地。而在堪舆实践中，历代对帝王阴宅所在的选择标准各有不同。宋夏时期，受五音姓利之说的影响，人们认为帝陵居所趋于完美的条件是“山高水来”、“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后有走马岗，前有饮马塘，岗埠形势，小顿大起，延连百里不断者”。就上述原则来看，除了因为地形所限，无西北地穹、东南地垂以外，其他要素西夏王陵可以说是莫不兼备^{[3]123}。

第一，背山面水，依附帝都，得形势之利。所谓山，当然指的是贺兰山。在西夏民众心目中，这是一座神圣之山。首先，贺兰山是龙兴之地。据史籍记载，李德明之所以迁都兴庆府，就是因为附近的贺兰山有突现真龙之说。今天看来，这显然是统治者演绎的一出神道设教、愚弄民众的荒诞闹剧。不过，在当时封建迷信充斥的西夏社会，无论是帝王大臣还是寻常百姓，是普遍接受这种说法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帝王被看做是龙在民间的化身，帝王的驾崩也就意味着龙之死。在西夏人的意识中，既然龙生前以贺兰山为居所，那么死后亦当以贺兰山为墓穴。因此，作为真龙天子的皇帝死后魂归贺兰是再好不过的安排。其次，贺兰山是帝王禁苑。西夏立国以后，在贺兰山中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院，成为皇帝议政会盟、游宴娱乐的重要场所。同时，这里还是西夏军队的主要驻地之一。元昊时期，全国有六分之一的军队屯集于此。在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帝王的皇家园林是禁止普通民众进入的。因此，估计有相当面积的贺兰山区域是普通百姓难以踏足的禁区和顶礼膜拜的权力之峰。再次，贺兰山是佛教圣地。西夏时期，社会各个阶层大多笃信佛教，皇帝更是以“佛王”自居。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之下，佛教的气象和声势达到了巅峰。正如西夏碑《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中所描述的那样“舍利丽黄金之色，齿牙宣白玉之光。依归者云屯，供养者雨集。”作为西夏的“神山之首”，贺兰山上有很多规模巨大的佛寺，直到明代还保留着“云锁空山夏寺多”的景象。史籍中记载的贺兰山名刹有佛祖院、五台山寺、慈恩寺、大佛寺等。在这些寺庙里，以回鹘僧人为代表的高僧，甚至皇帝和皇太后本人，经常主持气势宏大的礼佛和译经活动，从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佛教信徒对之顶礼膜拜。水和城指的是贺兰山以东平原地带的黄河和兴庆府。兴庆府作为西夏全国的军政中心，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关防严密而四塞险固。对于居于中间地带的西夏王陵来说，除了拥有东西两面的河山拱卫之胜以外，它还单独享受着繁花似锦的西夏帝都兴庆府的和平。

第二，地势高亢，绵延不绝，显帝王威仪。陵园所在正是贺兰山向东突出之处，这里既是离贺兰山距离最近、地势较高之处，又是距兴庆府城最近的山麓地带。诸陵海拔在1156米~1220米之间（兴庆府城海拔1110米），居高临下，面向银川平原，地势平坦开阔，附近没有任何障碍视线的地形地貌^[4]。试想一下，前来祭祀的皇帝家族、王公贵族、勋臣贵戚以及外国使节，从东边很远的地方望见高踞山麓、气势非凡的陵墓，哪一个不会生出对死去帝王仰之弥高、毕恭毕敬的心情呢？

第三，避风趋阳，坚固高敞，佑圣体平安。首先，陵区依偎在贺兰群峰之下，躲开了从西部阿拉善吹来的强大寒流，冷风寒气相对缓和弱小。陵区附近沟口不多，风口自然较少。山麓平坦开阔，能接受较多的阳光。每当旭日东升，陵台矗立，其影如柱，总会呈现出一幅神秘辉煌的景象^{[5]9}。郭璞的《葬书》上讲，“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西夏陵区这种一半封闭一半开放的地形聚集了热气，承受了阳光，有利于守护和祭祀活动的开展。其次，陵区地表遍布砾石、粗砂，土层薄，地基承载力大，保水性差，自然排水条件良好。地下水位深达十数米至数十米，春季不受土层冻融作用影响，水文工程地质条件优越，也便于地下施工构筑墓室。再加上陵区地壳由数条阶梯状断裂带组成，可以有效减缓地震的冲力和破坏^{[5]9}。这也是为什么自西夏以来，八九百年间，银川虽历经多次强烈地震，但陵区内黄土夯筑的陵台、角楼、神墙等依旧巍然屹立，很少塌毁的重要原因之一^[4]。再次，陵区地处内陆，气候干燥，一般年降水量不

足 200 毫米，加上位居山麓的焚风效应，雨水自然十分稀少。何况附近沟谷不多，陵墓所处地势较高，所以山洪频率与强度相对较小。在没有人为破坏的前提下，土高水深的地质环境，比较有可能避免地下水对墓中尸骨等的伤害，有利于陵墓的长期保存。

从《西夏地形图》上看，西夏都城兴庆府，处于平原灌区的中央，是全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府城西北，以“木栅行宫”为中心，是一系列深处贺兰山中的皇家宫廷林苑；府城西南，在贺兰山东麓，则是统治集团作为精神寄托的“祖坟”——西夏王陵。这三者正好联成一个大三角，构成相互呼应，封闭回环的态势。西夏前期，面对着辽、宋两国的主要威胁，契丹和北宋的军队曾从北、东两个方向进击西夏，甚至把藏于贺兰山离宫的元昊爱妃都虏走了，但居于大三角西南后方的陵园则是比较安全的。直到西夏王朝覆灭之日，陵园才最后落入蒙古军之手而惨遭破坏。可见，在西夏以军事立国、战争频繁的情势下，陵园布局也受到军事地理形势的重大影响。^[4]

二、整体布局

有关西夏王陵的文献记载首见于《宋史·夏国传》。传文在详述继迁、德明及其后十帝事迹的基础上，提到了各个君主的庙号、谥号、陵号。分别是太祖继迁裕陵、太宗德明嘉陵、景宗元昊泰陵、毅宗谅祚安陵、惠宗秉常献陵、崇宗乾顺显陵、仁宗仁孝寿陵、桓宗纯祐庄陵、襄宗安全康陵。安全以后，神宗遵项无陵号，献宗德旺无谥号和陵号。末帝□庙号、谥号、陵号均无。然而，《宋史》没有记载这些陵墓的具体位置。

关于西夏王陵具体位置和基本形制的明确记载，首见于明代朱楠编撰的《宁夏志》。在卷二十三中有“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传以为西夏僭窃时，所谓为裕陵、嘉陵者。其制度、规模，仿巩县宋陵而作”。其后的一些明清文献，如《嘉靖宁夏新志》和《西夏书事》等关于西夏王陵的记载，均不出以上两书范围。

事实上，在 1970 年代正式开展考古作业之前，学术界关于西夏陵区的信息是极其有限的。直到 7 号帝陵和 182 号陪葬墓墓主身份得到确定以后，西夏陵区中帝陵的位置和形制问题才有了较大程度的突破。事实上，6 号陵、3 号陵以及多座陪葬墓也有正式发掘，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明墓主身份的证据。^[2]以 7 号帝陵和 108 号陪葬墓为参照，目前，学术界形成了两种关于西夏陵区 9 座帝陵排列格局的假说。

一种观点根据唐、宋时期流行的“角姓贯鱼葬法”和“左昭右穆”宗庙牌位制度，认为 1 号陵为太祖继迁裕陵、2 号陵为太宗德明嘉陵、3 号陵墓为景宗元昊泰陵……依此类推，直到 9 号陵为襄宗安全康陵。这样的顺序排列，与文献记载的西夏 9 个陵号以及考古发现的 7 号陵为仁宗仁孝之寿陵的年代刚好符合。另一种观点，在确定 7 号陵为仁宗仁孝之寿陵、6 号陵为神宗遵项之陵后，按一组陵为“平原起冢”，另一组为“依山起冢”，各自成行排列，“平原起冢”的 1、2、3、5、7 和 9 号陵为第一行，“依山起冢”的 4、6、8 陵为第二行。第一行的陵墓要早于第二行的陵墓，第一行的 1、2 号陵在最南端，年代最早，按这种排列方式，除 1、2、3、7 号陵以外，其他 5 座陵墓的排列顺序，则与第一种意见完全不同。^{[2]328}

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根据西夏文残碑确定的 7 号帝陵为仁孝和 182 号墓主身份为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之外，其余已探明的 252 座陪葬墓的帝陵归属和墓主身份，我们迄今一无所知。

由于缺乏历史文献记录和其余陵墓的正式发掘，因此，要确定帝陵的排列、陪葬墓的归属和墓主的认定，显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细致的工作。

陵区北部偏东，有一座规模颇大的陵邑性质的建筑遗址。遗址内广场、道路、院落、水井和房屋等遗迹都清晰可见，布局十分规范整齐，总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四周筑有夯土城墙。城内分前、中、后三个部分，中部和后部的正中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殿堂，其他建筑多集中在城的前部和中部，并组成一座座封闭式庭院。遗址中发掘出大批色泽鲜艳的绿色琉璃板瓦、筒瓦、瓦当、滴水、脊兽、鸱吻和其他建筑装饰构件，如乳白色或青白色带有冰裂纹的小白瓷板瓦、侧边有黑色釉的牛郎合瓦、精雕细琢的石刻。在建筑物上大量使用琉璃构件，同期的宋代建筑也不多见，特别是作为贴墙面装饰用的小白瓷板瓦，在同期古建筑中更是少见。

此处陵邑既是西夏历代帝王举行祭奠时的活动和休息场所，又是管理、守卫陵区的文官武士和参与祭奠活动的僧侣等人的居留之处。从陵邑向东可直趋兴庆府城，所以陵邑也是当时整个陵区的出入门户。

陵邑附近，西干渠西岸、昊王渠及其东西两侧的自然冈丘上，由北向南分布着一系列西夏窑址，绵延七八公里，计几十余处之多。其中有烧制方砖、长方砖、条砖、板筒瓦、瓦当、滴水、琉璃饰件等建材的砖瓦窑和石灰窑。显然，它们是专为修建西夏陵园而设置的建筑材料生产基地^[4]。

严密的规划、宏大的气派和合理的布局，集中体现了西夏特色的帝王丧葬制度。在 10 到 13 世纪的中国，西夏陵区的平面布局是在王制的基础上有所僭越，但达不到帝制的规模和层次。这与西夏统治者面对国内民众号称皇帝，面对辽、宋、金等大国则俯首为臣的政治地位是一致的。

三、内部结构

（一）帝陵

每一座帝陵，既是整个西夏王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又是独立完整的建筑单元。它们均坐北朝南，呈纵向长方形，占地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以上。这些帝陵的外郭形制虽然有开口式、封闭式和无外郭式三种，但它们的内部结构却大体相同，分为角台、阙台、月城、陵城四部分。这些帝陵的外郭或宫城的长宽比例都在 1.5:1.7 之间，与史籍记载的兴庆府城郭的长宽比大致相当，两者遵循的设计原则或许都是所谓的“人形城”理念：一是城池形状与人体躯干的长宽比例基本一致，二是建筑平面布置与人体类似，具有均衡、对称的特点。^[4]下面以 3 号陵为例，看看西夏帝陵的内部结构与建筑特色。

3 号陵是西夏 9 座帝陵冢茔域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陵园。陵园坐北朝南，方向 150°，茔域面积 15 万余平方米。以角台为边界，陵园平面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南北长约 450 米，北端宽 272 米、南端宽 407.4 米。陵园的建筑计有 4 座角台、2 座阙台、2 座碑亭、1 座月城和 1 座陵城。这些建筑是据南北中轴线对称分布的。进入陵城，从南门到北门的中轴线上，建有献殿和陵塔，位于两者之间的则是埋葬墓主的地下墓穴，地面上还保留着隆起的长方形墓道。

4 座角台是陵园的外围建筑，也是茔域范围的标志。角台对称分布，南北各两座，角台之间应该有荆棘连接围绕，形成陵园外郭，现在已看不出外郭痕迹，只有四角的夯土墩体。

两座阙台是陵园正南门外的建筑，为左右对称，东西相距 100 米。阙台呈圆形，基底直径约 12 米，残高 8 米。由阙台向北 35 米，有两座碑亭建筑，也为左右对称，东西间距 80 米，亭台下有高大的砖构方形台基，边长 20 余米，高 2 米有余，其上建有直径 13 米的圆形碑亭。阙台和碑亭是陵园中仅次于陵塔的高大建筑，也是南门外的主要建筑。碑亭的设置，是西夏王陵独有的布局特色。碑亭北行 40 米，就到了月城和陵城，两城相接，平面呈“凸”字形状，南北总长约 232 米，东西宽 164 米。月城是陵城南门外的一座小城，类似瓮城，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城门开辟于南墙中间，推测是全木结构的乌头门。月城至陵城南门之间，设有神道，两侧各有两排石像生，呈对称形式。石像生均遭人为破坏，石雕碎块散乱堆积于地面，经清理后，发现石像生下有长方形台座。陵城前设置月城，营造出一种防御性态势，在帝王陵墓中为首次发现，也是西夏王陵独有的建置特色。月城内摆放石像生的做法，既能缩短神道、调剂空间，又能增加陵城的威严与肃穆。

陵城南北略长，呈方形，四面辟有陵门，南门为正门，面积较大，面阔五间，进深两间，位于当心间的南北两侧台基处，设有斜坡壕道，可入陵城。其余三门，没有踏道或壕道，似乎不能通行，只起到象征性作用。各门两侧，皆有门阙形建筑。每侧各有圆形墩台式三阙，靠近门边的墩台最大，然后依次渐小。

宫城四角置角阙，也为圆形墩台式建筑，东西对称，南端底角各有 5 座，北端底角各有 7 座。这些错落有致的建筑，丰富了陵城的视觉感受。在陵区的中轴线上，从南向北建有献殿、墓道、墓室和陵塔。献殿建在八角形台基之上，为圆形大殿。其南北两侧对称设有斜坡壕道。北侧壕道直对墓道南端入口，间距仅有 2 米，推测墓主灵柩经献殿祭拜后，出献殿北门，顺此斜坡壕道进到墓室埋葬。据已发掘的 6 号帝陵，推测墓的形制应是斜坡壕道，土洞墓室。3 号陵的墓室已被盗掘，形成直径 23 米的巨大圆形盗坑。陵塔建在北门台基外 0.6 米处，底座直径达 37 米，残高 21 米，可以想象其盛年雄姿。陵塔是陵园中最高大的建筑实体。值得注意的是，举凡阙台、门阙、角阙、献殿和陵塔之形制，都是圆形建筑，且呈 3、5、7 座或层，奇数布局或结构。

（二）陪葬墓

陪葬墓主人一般为爵高位重的皇亲国戚或贵族官僚。每座帝陵的陪葬墓多寡不等。在西夏陵区内，除了个别较大之外，绝大多数陪葬墓规模都比帝陵小得多。在形制上，陪葬墓没有帝陵所必有的阙台、角台、献殿等个体建筑，在墓冢的形状、城垣的颜色以及建筑材料的使用上，都有明显的差距。^{[6]799-800}据宁夏博物馆最近调查，陪葬墓分布方式多种多样，有一域双墓丛葬式、一域多墓丛葬式（包括一域三墓、一域四墓等）、联域并穴丛葬式等。一般大中型陪葬墓以黄土、砾石混合夯筑或分层夯筑；中小型墓则原地起土为丘，略加夯筑，再以石灰封抹；小型墓多为原地起土为丘，然后分层垒砌石块。^[4]从规模、形制来看，陪葬墓与帝陵有着显著的差别，反映了西夏现实社会和丧葬制度的等级森严。

四、形制特点

古代史家说，西夏帝陵“仿巩县宋陵而作”。事实上，西夏人绝对不是简单地照搬唐宋帝王丧葬制度，而是根据民族和地域的特点，有所取舍，创造性地发展出了西夏特色的帝王陵园制度。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

第一，规模较小。唐代帝王死后，通常一地一陵，甚至一县一陵，经过长期营建，规

模宏大；从宋帝陵开始，出现一地数陵，集中供奉现象，加之葬期有七月之限，故规模显著缩小。西夏陵墓，远承唐风，依山而建，气势固然磅礴，但偏居西北，政治地位较低，经济实力有限，难以大兴土木。在总面积上，西夏诸陵虽然不输宋陵，但就主体大小而言，则远逊宋陵。即便是西夏陵区内最大的3号陵，主体面积2.9万平方米，也不到北宋皇陵任何一座帝陵主体的三分之二。

第二，结构单纯。宋陵除陵城之外，还有附葬的后陵及侍奉死者灵魂的“下宫”等建筑，多数西夏帝陵没有发现任何后陵和下宫的建置。唯有3号陵区西北方有一座墓，是否为后陵，尚待考古发掘辨明。此外，西夏王陵布局简练，月城、陵城连接紧密，营造出一种防御性态势，这也是西夏王陵独有的建置特色。

第三，观念独特。西夏王陵多圆形建筑、塔式建筑。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奇数为阳，圆形为天，塔形为佛，3号陵多此类建筑，寓意当为天子之陵、佛王之冢。这充分反映了党项民族既尊儒教，又行佛法的文化特质。^{[2]14-15}唐宋陵园建筑四方四正，极为对称，体现出“中正无邪”的主题思想。西夏帝陵中，献殿、墓室、陵塔虽然位于南北一条直线之上，但是却与陵城中线并不重合，均偏西5°。这似乎反映了党项人独有的正殿放空、以避神鬼的观念。

第四，建筑不同。一是西夏陵园四域的角台建筑为唐、宋陵园所没有。角台是规定每座陵园兆域的界标，以角台为连线的兆域似乎亦可算作西夏陵园中的第三重或第四重城郭。二是西夏陵园的碑亭建筑为唐、宋陵园所没有。唐、宋陵园的石碑位于南神门前，碑立于平地，无建筑围护。西夏陵园中皆有两到三个碑亭，位于双阙之后、月城之前，位置显著。这一方面弥补了将石像生缩放于月城内，陵园前部气势减弱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碑亭作为给帝王歌功颂德的意义和作用。^[7]

第五，葬俗奇异。虽然深受唐宋葬俗的影响，但西夏同时也保留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夏狭小而简陋的土洞墓与中原传统的砖室墓迥然有别，似乎源于党项人“俗皆土屋”的生活习惯。西夏陵墓中的随葬品反映了与中原不同的社会习俗。夸张表情的力士碑座、随葬完整的羊、狗以及铜牛、石马等大量家畜家禽的骨架或仿制品，反映了党项民族“土坚腴，水清冽，风气广漠，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的内在气质。

以上这些特征既体现了西夏在王陵规划上对中原王朝帝陵设计的认同性，又保留了北方民族的文化特征，在规模上也与西夏对辽、宋、金称臣的政治地位相符合。

参考文献：

- [1] 许成，杜玉冰. 西夏陵 [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
- [2] 宁夏文物考古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 西夏三号陵——地面遗址发掘报告 [R].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3] 许成，杜玉冰. 西夏都城制度初探 [M] // 许成. 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 [4] 汪一鸣，许成. 西夏京畿的皇家陵园 [J]. 宁夏社会科学，1987（2）.
- [5] 韩小忙. 西夏王陵 [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 [6] 史金波. 西夏社会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7] 韩小忙. 西夏陵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 [J]. 宁夏社会科学，1993（6）.

（责任编辑 魏淑霞）